

唐代文學

第一期

《西北大学学报》丛刊



唐代文学



第一期

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编辑组

一九八一年四月

唐代文学

第一期 目 录

诗论文论研究	1	白居易的诗论 ——读《与元九书》札记	王拾遗
	10	略论韩愈的古文理论	吴文治
作家作品研究	24	白居易的出身、性格、思想 与其政治倾向的关系	周楞伽
	31	哀唐元和短命诗星李贺	孙浮生
	46	韦诗初探	姜光斗、顾启
	59	论柳宗元诗歌的语言艺术	杨春霖
	72	晚唐诗人曹唐及其诗歌	梁超然
	79	论牛峤的词	雷树田
	96	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张明非
名 篇 赏 析	102	介绍唐人的两首小诗	萧涤非
	104	李商隐《无题四首》初探	周振甫
	115	说杜甫的《兵车行》和《前出塞》	陈贻敏
	129	试说李贺《李凭箜篌引》	陈迥冬
	134	说李商隐的《马嵬》等三首	霍松林
	144	读温庭筠《菩萨蛮》	袁行霈
	148	王维诗赏析	刘禹昌
	163	《春江花月夜》赏析	马 群
	172	试析王维《终南山》	李云逸

诗词今译	176	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散 绎	傅庚生
风格·流派	190	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 形成及发展	万云骏
	199	《裴铏传奇》与浪漫主义	周楞伽
问题探讨	207	如何评价韩愈诗歌的思想意 义	王启兴
	221	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	董乃斌
	231	李白幽州之行探	薛天纬
	241	李贺诗歌艺术上的瑕疵	房日晰
	254	评价韩愈和永贞革新关系的 几点浅见	阎琦
考证·诠释	268	薛涛生卒年岁考	彭云生 遗作
	272	韩诗《游太平公主山庄》索隐	陈迺冬
	275	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	郁贤皓
	286	关于杜诗中几个词语的训释	王仲儒
教学研究	294	唐诗教学中的古为今用问题	高海夫
文化交流	301	唐代长安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武复兴
知识·掌故	311	唐词略说	宋汉濯
	319	诗坛掌故二则	韩小默
作家传略	324	陈子昂小传	韩理洲
	328	王昌龄小传	李云逸
绘画·篆刻	封二	写杜甫《不见》诗意	蒋兆和
	封三	写王维辋川诗意	刘旦宅
	封二	柳宗元《江雪》篆刻	秦彪
	封三	李商隐、韦应物诗句篆刻	戴一峰

封面设计： 于林

白居易的诗论

——读《与元九书》札记

一

唐代诗人中，对诗歌创作理论阐述得比较系统一些的，应该首推白居易。白氏写诗理论的形成，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一方面在实践中又有所创新，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为他写诗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白居易提笔写诗，大约是少年时期就开始了的。据他自己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①这里所说的“二十已来”，是指他准备应考进士时的情况，实际上开始写诗大约是在他漫游江南的时候。从现存的诗集中看，最早的一首应该是《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因题下注云：“时年十五”。其次是《王昭君二首》，题下自注云：

“时年十七”。还有《病中作》，题下自注云：“时年十八”。综观这一时期的诗，不过几十首，都是“直抒胸臆”的记事抒情之作，似乎还没有甚么理论指导。

白居易注意诗歌理论的研究，是在他入朝任左拾遗以后，也就是唐宪宗元和元年以后，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自

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②他所说的“为时”、“为事”，要言之，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反对那种泛泛空论之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新乐府》、《秦中吟》及其他讽谕诗，正是这种认识的体现。他在《寄唐生》诗中说：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又如在《伤唐衢二首》之二，有句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諫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由此可见，白居易写诗的理论，是源于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他的生活经历大有关系。他由于家贫多故，为衣食，为前途，颠沛流离，得以对当时社会有所了解，于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认识，所以在他应试前写的《策林》七十五篇，涉及到国家许多基本问题。《策林》的第六十九，主要论述的采诗问题。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策林》写于元和元年，《新乐府》、《秦中吟》等诗大都写于元和初年前后，说明他对诗歌的认识，与他的政治思想是密

切关联的。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成熟的时间，大约是在元和十年，代表作品，就是著名的《与元九书》。诗人在信末云：“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故知此信写于元和十年的十二月。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过一首《读张籍古乐府诗》，他所运用的标准、观点，和《与元九书》中陈述的观点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元和十年是白居易诗论完成的一年。

白居易从不懂写诗理论到完成比较成熟的诗论，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创作实践，他不断向古代诗人学习，并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逐步地得出一个清晰的线索。他的诗论之所以能够完成，首先是他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并且敢于发表创见；其次是他深刻地理解现实生活，为了政治上的需求，他认识到诗歌的重要性；再其次，就是他酷爱诗歌，而且他就运用诗歌进行过战斗，所以体会得特别深刻。如果上述理由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白居易的诗论是在实践中完成的。

二

白居易的诗论，主要是继承并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曾以此为已任，而且就是这样做了的。他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③他所说的“诗道”，认为是《诗经》肇其始，所以他特别重视“六义”。他的主要论点是：

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騷，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④

这一段议论比较重要，因为它是白居易诗论的基点。首先他看到诗歌的作用，认为是治理天下的“大柄”、“大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理解了诗歌可以为政治服务。其次，又谈到诗歌组成的要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感人心的莫先乎情，有情就要用语言表达，表达时就要讲究声韵，但最重要的还是诗歌的涵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诗的思想”，故而他说“莫深乎义”。当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譬如他说的“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就是不对的，甚至把人和豚鱼鬼神都等同看待，就出了笑话。可是，对一千多年前的诗人，是不应苛责的，在诗歌理论上能有上述一些见解，也就难能可贵了。

白居易对诗歌的产生，曾经有过论述。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他所说的“感于事”，就是指的客观现实。这和《诗大序》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相一致的。一般诗人，无不是“感于事”才写出诗来，这是个正常的规律。可是，白居易却把它提到一个首要

地位，而且强调要做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显然这比过去的诗人们，要求得就具体而严格了。

白居易正是以这种标准，回顾了在他以前历代的诗歌发展。他认为周衰秦兴，“于时六义始刳矣”。这个刳字形容得好，就是说六义已有磨损现象。至于两汉时代，则是“于时六义始缺矣”。这个缺字也用得好，显然是程度加重了。到了晋宋，虽有谢康乐、陶渊明诸家，也是难挽颓局，“于时六义寝微矣，陵夷矣。”到梁陈隋时代，“于时六义尽去矣！”白居易这种看法，显然是有些偏激，但从发展的轨迹来考查，不容否认，宋齐梁陈这一段时间，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的确迷漫了当时的诗坛。但是，现实主义的诗文，也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只是有些微弱而已。全盘否定，不够科学。

入唐以来，白居易推崇的前辈诗人，有陈子昂、鲍防、李白、杜甫数人，但还觉得他们不够劲儿。说李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说杜甫的诗“可传者千首”，然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敬服陈子昂与杜甫的。唐衢曾写诗鼓励 he 可以与陈杜比肩，他感激得很，所以在《伤唐衢二首》诗中有句云：“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陈子昂仰慕汉魏风骨，有志改革诗风，他的《感遇诗》，一扫齐梁气息。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杜甫的成就，在于他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可是白居易还嫌杜甫的成就不够大，可以看出他的要求和理想，该是多么高了。

有的人认为白居易的诗论，已经扬弃了儒家的“温柔敦

直”的诗教，其实是不确的。白居易主张用诗歌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裨补时阙”，“救济人病”；或者说“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的要维护皇朝的统治。他对现实种种问题，的确心怀不满，有时指斥的言论也很激烈，但他无意动摇或者忽视“君主”的权威，在他心目中永远存在一个“吾皇万岁”的形象。白居易的诗歌中，以讽谕诗最为直切，正如诗人自己所解释的：

“讽谕者，意激而言质。”白居易写讽谕诗的目的也是比较清楚的，据他说：“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⑤如此委婉的讽刺，不正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吗？白居易有句云：“仆本儒家子，待诏金马门。尘忝亲近地，孤负圣明君。”象这样一个恪守封建秩序的人，若使之扬弃“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不大可能的吧！

白居易的诗论是现实主义的。充其量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不应该把它抬得过高，如果说得与其实质相差过远，那将是不适宜的。

三

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对某些诗人的评论，是坚持他的“诗论”的原则的，从不因自己的偏爱而妄自吹嘘。他很喜爱陶渊明的诗，曾经说过：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又说过：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可是他对陶诗的评价，则直接指出缺点：“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言外之意，陶诗多描写田园的生活、风光，却未能反映现实，不能不算作美中不足！

白居易对谢康乐是非常敬仰的，对于他只写山水诗提出了批评：“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显然他是为谢灵运惋惜，认为谢的才华横溢，如果把精力放在反映现实上，对诗歌发展的贡献还要大些。可是在写《与元九书》的第二年，反复诵读了谢灵运的诗，他又有新的体会，看法有些改变，他说：

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⑥

这个认识，比过去前进一步，就是他理解到谢康乐的山水诗，不是纯写山水，也是有所“兴谕”的。由此可见，白居易对诗歌的鉴别与欣赏，是以他的“诗论”作为标准的。

对于李白和杜甫，推崇备至，但对他们的成就，不大满足，所以才说：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⑦

这是白居易精读李杜诗集后写的读后感，显然他觉得李杜二位诗人的“好诗”还嫌太少。这种说法与《与元九书》中的论调是一致的。所谓“好诗”，就是指能够真实反映现

实的篇章。

白居易对同时代的诗人，最尊重张籍。籍诗作不多，但接触的社会问题比较广泛。特别是他的乐府诗，非常与白居易的“诗论”要求相合，所以白居易充分给予肯定。他说：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⑧

至于对那些年轻的无名的诗人，只要符合他的“诗论”立意的，无不予以赞扬。正如他所说的：“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足下，指元稹也。邓鲂此人，无考。白居易《读邓鲂诗》有句云：“天不与爵寿，唯与好文词。”又说：“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禄不及，新婚妻未归。”看来邓鲂诗写得不错，可是未考上进士，也没有结婚，就死去了。唐衢，“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看来与白居易的思想极其接近，故而引为同调。唐衢的诗，今已失传，从白居易对他的评论，可以想见其诗的成就。白居易说：“怜君儒家子，不得诗书力。五十著青衫，试官无禄食。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散在京华间，何人为收得？”如果真的有诗一千首，不能算个小诗人吧！论其创作方法，诗的思想内容，与《诗经》差不多，说明它是完全符合白居易的“诗论”精神的。至于元稹更用不着说了，两人友谊至笃，论诗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用白居易的话说：“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

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白居易所以把这三个人引为知己，主要是对诗歌的观点彼此相同的缘故吧！

我们综观前边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论所以比较系统、完整，与他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他既吸取了前人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论，同时又有自己的体会和创见，于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论”，在古代文学理论中，她是一朵放射异采的鲜花。

注：①②③④均见《与元九书》，《白香山集》卷二十八。

⑤《与杨虞卿书》，《白香山集》卷二十七。

⑥《读谢灵运诗》，《白香山集》卷七。

⑦《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白香山集》卷十五。

⑧《读张籍古乐府诗》，《白香山集》卷一。

· 补 白 目 录 ·

30	“沧洲”与“沧州”	田 未
58	关于“三万六千日”的典故	理 洲
71	“好放孤寒”小议	晓 蕾
101	小资料：《全唐文》	默 之
128	小掌故：“行卷”与“白麻衣”	陈 雷
206	介绍《裴铏传奇》	戴 玄
285	奖掖后进	潘斯人
331	稿约	

略论韩愈的古文理论

吴文治

韩愈是中唐时代杰出的古文家。早年曾从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学古文；与萧颖士的儿子萧存、李华的从子李观，都是莫逆之交。这说明他和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在学术上是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的。他一方面从他的先驱者那里吸取了思想材料，总结了前人关于古文革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同时，由于当时客观的社会政治条件，使他有可能和柳宗元等古文家一道，把与古文革新相结合的复古思潮推向新的高潮，在不断的社会实践和古文革新的斗争中，丰富和发展古文理论。

韩愈反对齐梁骈俪文风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在《荐士》诗中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他不顾时人的“惊”“笑”“排”，主张作具有独创性的古文^①。他对于自己的文章，“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②。他坚决向不良文风进行斗争，以争取古文革新的胜利。

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他接过他的前人早已提出的这种理论，赋予了它崇儒排佛的鲜明的

时代色彩，在中唐古文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号召作用。

韩愈自述他学古文的目的是为了学古道。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答陈生书》中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他所说的“道”，就是他在《原道》中所宣扬的儒家正统思想；他所说的“辞”，就是他在《答李翱书》中提倡的“三代两汉之书”。他说：“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③看来他是以学道为主，通辞为次，学道为目的，通辞为手段的。

他自述他提倡写古文的目的也是如此。他说：“读书以为学，缀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④这就是说，写古文是为了以文载道，“道”是“文”的内容，而“文”是“道”的形式。文字不必华美，只求能“言适其要”即可。

韩愈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这么说来，似乎他和宋代的道学家们就没有什么两样。不然。韩愈对“文”与“道”的态度，与道学家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从宋代道学家和后人对韩愈的评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程颐就说：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⑤在程颐之前，王安石的友人吴孝宗，也就说过：“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⑥他们都认为韩愈“因文而及道”是“倒学”。这就是说，只有象道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求道而忽文，才不是“倒学”。这个区别是很清楚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才导致他们在“文”的方面的成就有着巨大的不同。

元人方回曾说：“韩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学由文而入。”⑦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就韩愈在“文”与“道”两方面的成就比较而言，他在“道”的方面的成就是远不如他在“文”的方面的成就的。他所谓的“道”，并没有比《六经》的范围有什么新发展；而他的“文”，则对六朝以来的不良文风，起了摧陷廓清的作用。这一点，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苏轼是早已看到了的，所以他在《论韩愈》一文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⑧苏轼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就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韩愈的地位并不那么崇高；而在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却有着很高的地位。

二

韩愈的古文理论自成体系，相当系统而详备。我们仅择其要者略加论述。

韩愈把加强作家的自我修养，看作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在《答尉迟生书》说：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而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答李翱书》又说：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

这两段文字，都说明了作家提高修养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文章需要有充实的内容，而文章的内容就直接与作家的修养息息相关。所谓“本深而末茂”，“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而无疑”，都是说的这个道理。他强调作家修养当以立行为本，立言为表，认为只有“仁义之人”，“其言”才可能“藹如”。他这种对作家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的论述，至今仍能给人以启发。

至于如何去提高修养，韩愈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标榜的。他在《答李翊书》中说：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他把精读三代两汉的书籍和实践三代两汉儒家之道，作为自己修养的主要方法，看来态度是相当认真的，以至于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地。在《进学解》中，他除了叙述他学习的刻苦性，还比较具体的说明了他学习的广泛性。他不仅学习《六经》，而且对《庄》《骚》也很重视，对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也都涉猎。这是他和以前的古文家所明显不同的。清人薛雪称赞“《进学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学者当于此体会”⑨。恐怕就在于韩愈在这里跳出了前人的窠臼，现身说法地提倡广